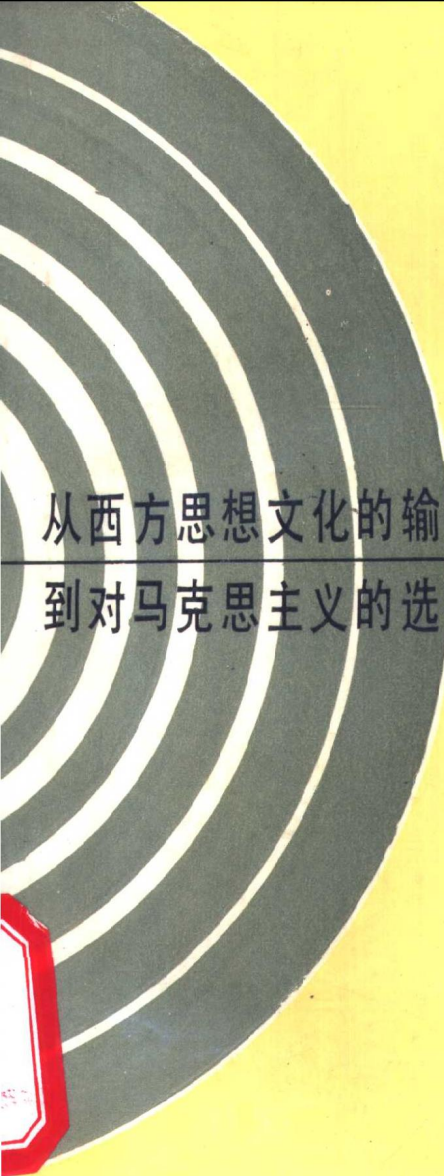


赵德志 著

西方意识的冲击与回应



从西方思想文化的输入
到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

辽宁大学出版社

西方意识的冲击与回应

——从西方思想文化的输入到对
马克思主义的选择

赵德志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沈阳

主 审 杨恩寰
责任编辑 王本浩
封面设计 刘桂湘
责任校对 申笑梅

西方意识的冲击与回应

——从西方思想文化的输入到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

赵德志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崇山西路3段4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建平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23 印张: 5.625 字数: 12(千)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5610-0751-5

B·38 定价: 2.50元

目 录

- 一、绪 论
 - 1.1 一个富有现实启发意义的理论课题·····1
- 二、戊戌变法时期西方哲学的渗入
 - 2.1 戊戌变法时期西方哲学渗入的政治思想背景 ·····12
 - 2.2 戊戌变法时期西方哲学渗入的基本情况 ·····18
 - 2.3 戊戌变法时期对西方哲学渗入的几种反应 ·····24
- 三、五四运动时期西方哲学的涌入
 - 3.1 五四前后西方哲学大规模涌入的历史根由 ·····32
 - 3.2 五四前后西方哲学大规模涌入的主要途径 ·····37
 - 3.3 五四前后西方哲学大规模涌入的具体过程 ·····39
 - 3.4 五四前后西方哲学涌入后的流行特点 ·····45
- 四、新文化运动领袖对西方哲学的全盘性迎受
 - 4.1 新文化运动领袖对西方哲学的初步认识 ·····52
 - 4.2 陈独秀对西方哲学的迎受 ·····56
 - 4.3 胡适对实用主义的褒扬 ·····63
- 五、东方文化派等对西方哲学的全面性拒斥
 - 5.1 东方文化派学衡派对西方哲学的根本立场 ·····71
 - 5.2 学衡派对西学输入运动的否定 ·····74
 - 5.3 东方文化派对西方哲学的拒斥 ·····77
- 六、现代新儒家学派对西方哲学的创造性回应
 - 6.1 现代新儒家对西方哲学的基本态度 ·····85
 - 6.2 梁漱溟对生命哲学的援进 ·····88

6.3冯友兰对新实在主义的融会	99
6.4贺麟对新黑格尔主义的贯通	111
七、国民党官方对西方哲学的功利性汲取	
7.1国民党官方对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的根本态度	123
7.2陈立夫对生命哲学的接纳	127
7.3蒋介石对意志主义的汲取	134
八、先进知识分子对外来思想的科学性评判	
8.1先进知识分子对外来思想的原则立场	144
8.2瞿秋白对西方意识的初步分析	154
8.3艾思奇对西方哲学的初步评判	159
九、结语	
9.1对八十年代“文化热”、“西学热”的再思考	166

一、绪 论

1.1 一个富有现实启发意义的理论课题

近年来，一场举世瞩目的“文化热”正在中国思想界蓬勃兴起，深入反思中国传统意识，重新评价西方现代思想文化，积极思考中国新文化、新哲学的建构，已成为当前学术界最为热门的话题。

这场热潮，自八十年代初开始，至今已延续了将近十年。它不仅把国内的大部分学者卷入其中，而且也引起了海外学术界的关切与注目。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全国各地先后召开了各种类型的文化问题座谈会、讨论会。如“中国文化史研究者座谈会”，“中国近代文化史讨论会”，“全国东西方文化比较讨论会”，“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等等。这些座谈会、讨论会，纵贯全国，波及海外，既提出了一系列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又造成了重视和加强文化研究的舆论和声势。其二，一些高等学校和科研单位，陆续成立了一批研究中外文化的机构和团体，如“中国思想文化研究中心”，“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中心”，“近代史文化研究室，”……这些机构，大多创办了一些属于文化学科的研究刊物，如《国学集刊》、《东西文化比较研究》等等。这些研究机构的建立及有关刊物的发行，组织了研究队伍，开辟了研究阵地，使“文化热”不仅声势夺人，而且经久不衰。其三，各家有影响的出版社，争相推出“文化丛

书”，目前所见到《中国文化丛书》、《中国近代文化史丛书》、《文化哲学丛书》、《现代思想文化译丛》等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另据统计，仅自1985年以来，公开出版的有关文化问题的论著，已达四百余部。这些丛书和论著的出版，使“文化热”声势激增，更加引人注目。

总之，这的确是一场热，是一股潮，其延续时间之长，波及范围之广，涉及问题之深，已超过了建国以来任何一次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讨论。

面对这样一股勃然而兴、经久不衰的学术思潮，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三十年后，会出现这样一股热潮？其根源何在？意义如何？对此，时下的学者曾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并给予了令人信服的回答。其看法大体是：此乃改革开放走向深化所致，是人们对建国以来的历史进行更深入反思的结果。

首先，大家都近乎一致地认为，当前的“文化热”，是改革开放日益走向深化的必然。在学者们看来，社会是一个有机的结构系统，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社会结构机体的改变，光依靠引进西方的科技、工艺和兴办实业是不能成功的，还必须要有政治体制和观念文化的改革来与之相辅相成。也就是说，随着经济开放改革的步步深入，政治改革与观念意识的变革，必然要提到议事日程。而思想意识的变革，乃是整个改革的关键所在和“最后一境”。这是因为，在中国，以从属和依附于政治的知识分子阶层为轴心建构基础的社会心理文化，是制衡整个社会动向、经济发展的强有力因素。旧的思想意识不扫除，传统的价值体系不打破，经济、政治的改革就难以深入展开。这正如有的学者所说：“随着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行，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也相应而生。然而却与

人们多年来形成的陈旧观念发生了冲突。诸如锐意革新与因循守旧、政治民主与个人专断、按劳分配和平均主义……如此等等。旧的思想、观念、意识、习惯，乃至思维方式，都可能成为改革的阻力和障碍。因此，清除传统文化中的惰性因素，进行思想文化的更新，便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①

其次，人们都不约而同地肯定，当前的“文化热”，是人们对建国以来的历史进行更深入反思的结果。学者们认为，建国以来，我们从来没有对传统文化进行过全面的、有系统的深入反思。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方面也有过严重的挫折和失误，其中最严重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而这场浩劫中发生的种种荒唐事情，诸如个人迷信、家长作风、愚民政策、自我封闭等等，恰与中国几千来的封建主义专制传统密切相关。因此，在人们深入反思“文革”的时候，便不能不感到彻底清除封建主义旧意识的余毒与影响的必要。

以上这些看法，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深掘了当前“文化热”的起因，其观点不无深刻之处。然而，如果我们能再作进一步的观察与思考，就会发现当前的“文化热”还有另外一层原因，这就是现代西方思潮的挑战，是开放后涌入的现代西方意识的冲击。

众所周知，对外开放所带来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结果，就是西方现代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的引进，其中特别是西方意识的输入。所谓西方意识，即是以近现代西方哲学为核心

^①王俊义、房德邻《对八十年代“文化热”的评价与思考》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8第1
版，385页。

的，包括西方宗教、伦理、艺术、政治理论等等在内的一整套观念体系。这一体系，既是西方民族风俗习惯、价值观念、道德意识及宗教情绪、民族性格的历史积淀与理论升华，又是西方近代现代化物质生产与社会制度的观念反映。是西方文化的思想或心理层面，是这一文化的深层结构。这种总罗上述内容的西方意识，一方面与中国传统的形成于小农宗法社会基础上的观念意识或文化心理结构相抵牾，一方面又与作为当代中国的指导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相矛盾、相冲突。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日益扩大，现代西方意识与中国传统意识、与马克思主义的冲突也日渐加剧。如就哲学而论，西方意识中的主张个体感性身心决定论的人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物质存在决定论即多少有些扞格不入，而主张以分析、实证为基本原则的科学主义与中国传统的以意会领悟为基本原则的直觉主义又恰相冲突。就价值观念而论，西方意识中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实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以群众利益为中心的集体主义、理想主义，以及与中国传统意识中的以压抑个性、否定个体意志要求为特征的群体主义、道德主义亦似乎不可同日而语。另外，再就政治观念开论，西方意识中的在承认每个个体独立人格和选择自由前提下的平等观念与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并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发生很大影响的等级观念、特权思想等等，就更大相径庭了。这种日益加剧的冲突，必然迫使人们去思考如何处理西方意识、传统意识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去反省传统文化，去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

我们说当前的“文化热”是西方意识冲击的结果，这从当前关于中国未来文化出路指示的几种有代表性的意见中，便可明显地观察到。

第一种是“儒学复兴论。”这是一批海外华裔学者提出的一种主张。这些学者，以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重新的历史考察与理论评价入手，提出他们关于中国未来新文化建设的意见。在他们看来，胡适、陈独秀和鲁迅等五四时期的新青年们，把西方文化永恒确定为“现代文化”，把中国文化一次性地规定为“古代文化”，从而将西方文化与现代文化混为一谈，以为中国的现代化即是西方化，这是极为武断和错误的。他们认为，中国文化并非古代文化的代名词，中国传统意识也不是封建主义思想的同义语。在中国传统意识中，具有与西方近现代科学和民主的同构因素。“在儒家或受儒家影响的思想传统中，没有开出一条科学发展的道路，特别是没有希腊文明以来的逻辑推理和培根以来的实证科学的发展。这是历史事实。但是儒家传统中有无科学精神则是另外一个问题。”^①“在中国的老传统（特别是儒家思想）中，肯定有民本思想，……因此，儒家如何能够把孟子以来的民本思想转化为民主制度的建构？另外，以三纲五常为代表的传统的非法律性的礼俗和西方法律精神如何交融？这些都是大问题。”^②这也就是说，在中国新文化建设问题上，中国必须有自己的特殊的文化认同，这就是在传统儒学中寻找新文化建设的途径。

第二种是“文化重建论”。这是与“儒学复兴论”针锋相对的一种意见，是一批青年学者提出的从根本上挣脱、改造传统文化，由此达到中国文化重建的一种主张。他们认为，中国未来新文化建设所必取的途径，决不是以传统文化

①杜维明《创见性的回应》、《书林》1986、8期。

②同上。

为本位去吸收或同化新的文化因素，更不是对传统文化进行所谓“创造性的转换。”相反，必须全力创建一个中国文化的现代系统。在他们看来，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使中国传统的文化形态再也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了。因此，问题的实质不在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到底有多大，而在于中国文化必须挣脱其传统形态，大踏步地走向现代形态。所谓批判的继承，并不是在已经过去的东西中挑挑拣拣，而是对它们的整体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和彻底重建。继承发扬传统的最强劲手段，恰恰是反传统。因为要建立一个现代新文化系统，第一步必须是全力动摇、瓦解、消除旧系统，舍此别无选择。他们还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超稳定的、封闭性的系统，根本不可能产生任何启蒙，也不可能通过自我批判更新，只有靠引进外来的文化，才能创造出中国人不曾有过的现代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我们应该打破固有传统模式的和谐，重建‘中国文化本体’；应该以‘开放的心灵’，迎接传统价值体系的崩溃。”^①这就是彻底重建论者的口号。

第三种是“西体中用”论。这是国内几名颇有声望的中老年学者的主张。这种意见认为，人类文明从结构上考察，含有两个构成部分，一是工艺社会结构，是外在的物质文明结构；一是文化心理结构，是内在的精神文明结构。现代物质文明虽然是全世界所共同走的道路，但它首先是从西方来的。我国现代社会的主导意识——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科学理论也是从西方来的。由此，中国文化在现代的根本出路就在于“西体中用”。所谓“西体”，就是现代化，而“中用”就

^①杨念群《打破和谐》《青年论坛》1986，7期。

是怎样结合于中国的实际，也是中国化。“‘现代化’并不就等于‘西方化’，但现代化又确乎是西方先开始，并由西方传播到东方来的。现代化大工业生产，……以及生产它们的各种科技工艺、经营管理制度等等，不都是从西方来的吗？在这个最根本的方面——发展现代大工业生产方面，现代化也就是西方化。”^①同时，这种意见认为，儒学作为几千年来的社会统治意识，已成为中国文化心理结构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它的基本观念，始终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障碍。但儒学传统的“天人合一”论，强调人际间的和谐和稳定，强调人身心的平衡和愉快，却可以在新的现代化的条件下加以继承、改造和发展，对世界未来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

以上几种意见，尽管意向不一，但显而易见，都是在西方意识冲击下发出的反响。其中的“儒学复兴论”，直接就是对西方意识挑战的一种回应；而“彻底重新论”，则表现了对西方意识的一种全盘迎受的态度；至于“西体中用”论，在实际上更是要求把西方文化从总体上移植于中国。简言之，它们都是以西方现代文化作为参照体系和价值尺度，来衡量和认识中国文化，提出中国未来文化发展的战略与策略的。

如果上述看法不错，如果现代西方意识的冲击确为当前“文化热”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我们对中国近代以来的种种文化论争的回顾便不无意义。这是因为，当前的“文化热”与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以来的文化论争，从原因上讲，都发端于西方意识的冲击，都是对这一冲击作出的回

^①李泽厚《漫说“西体中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第323页。

应。

诚然，当前的“文化热”并不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论争的简单重复，这是因为时代不同了，论争的性质及人们的认识水平，必然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如就时代背景而言，近代以来西方意识的输入对中国人民来说是被迫的。一方面西方列强以铁与血的手段迫使中华民族接受其观念意识，一方面被压迫、被奴役的中国人民在西方的军事、政治的重压之下，被动地在西方意识中搜寻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当代则是我们主动地敞开大门，去输入、去引进西方的思想文化，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和要求对西方意识进行选择、修正乃至改造。再就论争的性质而言，近代以来的文化论争，其主题是解决中学与西学、旧学与新学的关系问题，是解决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古代文化与近代文化的关系问题。而当代论争的主题则是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意识的关系问题。最后就论争的目的而言，近代以来的文化论争是为了实现中国文化从古代形态到近现代形态的转变，使中国文化达到与西方近代文化并驾齐驱的境地，而当代的论争则是为了用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先进思想文化丰富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继续占据人类思想文化发展最高成果的位置，成为中国人民走向现代化进程中所必需具备的文化意识。简而言之，当前的“文化热”，要解决的是现代西方意识、中国传统意识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更为复杂的关系问题，而不是中与西、古与今的简单问题。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当前这场八十年代海禁重开后的文化讨论，虽然不是近代以来种种文化论争的重复，但确也是它的更高层次上的复归或继续。它们所面临的同样问题，都是如何认识与对待汹涌而来的西方意识。因此，就不

能不给历史论争的回顾以一个重要的位置，不能不把历史上文化论争经验教训的总结作为当前文化讨论的一个重要课题。

那么，这种回顾与总结的意义究竟何在呢？

首先，这种回顾和总结，可以帮助我们追溯当前文化热更深更远的源头。如上所述，当前的文化热与历史上的中西文化论争，都是对西方意识冲击的一种回应。既然都是回应，其所采取的方式必然会有许多相同甚至是相承之处。在历史上的论争中，曾先后出现过坚持华夏中心主义的“回归古典论”，坚持欧洲中心主义的“全盘西化论”和坚持文明多元主义的“中西融合论”。这些理论，虽各有偏颇，但作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在西方意识撞击面前作出的选择，却又都含有不同程度的合理性因素。这些因素，并没有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消失，而是被后来某一学派所承续下来，成为一种新的回应方式的滥觞。如当今所谓的“彻底重建论”，与五四时期的“全盘西化论”便有某种相通之处，而所谓的“儒学复兴论”，就更是四十年代新儒家“中西融合论”的直接继承了。如此，对近现代以来西方意识冲击及其回应的研究，便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考察当前文化热中各家各派思想观念的历史渊源，考察他们的主张在何种程度上重复或超越了历史。

其次，这种回顾和总结，可以帮助我们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找到评价当今文化热的借鉴。当今的文化讨论与历史上的文化论争，既然同是西方意识冲击的产物，两者就必然会遇到相同的问题。如：如何从总体上认识和把握西方文化？面对西方意识的挑战，应当做出何种选择？等等。这些问题，在历史的论争中均被探讨过、尝试解决过，也均被历史残酷检

验过。有的主张经得起这种检验而结出了一些现实之果，受的则经不起检验而最终成为少数人的一厢情愿，更有的遭到历史的无情嘲弄而成为千古笑柄。现代文化热的各种意见既然至少在形式上与历史论争中的某些意见不无相通之处，那么，对历史上论争的回顾，便可以帮助我们从中获得某些借鉴，供我们评价今天各种意见时参考。

总而言之，历史有如一条上游冰冻、下游汹涌的长河，其中既有我们过去的已被冻结了的形象，也有从上游渗流下来继续活跃在我们今天血液中的因子。对历史进行反观，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今天，预示未来。

二、戊戌变法时期西方哲学的渗入

西方意识的冲击以及中国思想家们对这一冲击的回应，乃是五四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这部历史活剧中最为激动人心的一幕，当我们试图对这一幕的情节进行咀嚼欣赏的时候，不可不追述一下导致它开场的前一幕的内容。

五四后不久，当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亦即中国人民向在文化上高出自己整个一个时代的西方寻找富国强兵之道的历史刚刚告一段落而转向新的一幕之际，便有一位著名学者站出来从理论上进行精辟总结了。他便是梁启超。1922年，梁启超发表了他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文中写道：

“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这点子觉悟，一面算是学问进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学问进步的结果。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度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所以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了。”

在这里，梁启超把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发展明

确地划分为循序递进的三个阶段，认为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历史，从文化发展的角度观察，即是中西两种文化相接触、相冲突的历史，并认为这一冲突的历史，是一个由文化器物层面而文化制度层面而文化心理层面的步步深入过程，而文化心理层面的冲突，即中西观念意识的冲突，是这一历史的最后阶段。这种看法，大体准确地描述了鸦片战争以后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与逻辑的真实进程。然而，这里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作为最后阶段冲突的西方意识的冲击以及中国意识对这一冲击的回应，究竟开始于何时？毋庸置疑，中外文明的全面比较，新旧意识的生死较量，确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事，但如果我们能作更仔细的分析观察，就会发现这一时期文化思想运动的发端，却早在戊戌前后就已经开始了。其时，虽未发生有似五四后那样的狂飙运动，没有发生五四后那样的中西意识之间的剧烈冲突，但以西方近现代哲学为代表的西方意识却已经开始渗入，中西文化在心理层面的比较已经开始。与此相应，对西方意识冲击的各种回应方式也就初露端倪了。

2.1 戊戌变法时期西方哲学渗入的政治、思想背景

正如梁启超所述，在文化方面，我们是首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的。而这种感觉的产生，恰源于我们首先受到的是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1840年，满载着金发碧眼之“洋夷”的火轮船，撞开了古老中华帝国的大门。从此，两种不同的文化刀兵相见了。而初次遭遇的结果，却是那样的出乎人们意料：有着“十全武功”的天朝上国，竟惨败于万里海外漂摇而来的“么尔小夷”！我们究竟败在哪里？在当时人们看来，原因也许就在于火器练兵之类，因为事实正是西夷的坚